

秘书眼里的毛泽东是什么样的？

朱德为什么会搬出中南海？

杨尚昆如何指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搬进北平？

.....

作为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亲历者，
他们见证了那段不寻常的往事。

林彪：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挺过寒冬的历程——在
执行局总理专机任务的日子里——朱德搬出中南海始
末——杨尚昆与中共中央第三次大搬家——和领袖们
在一起的日子——父亲那自患殉国前后——郭吉成观
观庐山会议——我的父亲吴德峰曾是“中共特务三大
亨”之一——我所了解的胡风案件点滴

国事

旋律和含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少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一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一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他成了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使这一决议让群众接受,便大造舆论,大肆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行总理专机任务的时候,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总理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在特定场合下说的事情,即使过了好几年,仍能记得很清楚。

一次,总理到西郊机场迎接外国来访的客人。客人还没有到达,总理在同其他首长谈话时偶然想到有关飞机基本性能的问题。当时我就站在总理身边,总理顺便问我专机部队几种主要飞机的飞行高度、巡航速度、安全性能等方面的情况,我一一做了回答。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一次,总理又来到机场专机停机坪。站在那里同总理说话的一位首长,谈话中问我英国制造的“子爵”号飞机平时飞行的高度是多少,每小时的飞行速度是多少。还未等我回答,总理已经抢在我前面准确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作为一名专机飞行员,我不得不为总理惊人的记忆力而折服。一个国家的总理日理万机,需要记的东西太多了,飞机性能本来属于专业人员掌握的内容,总理却能记得如此清楚!对总理这位伟人的肃然敬慕之情从我的内心油然而生。

西郊机场是日本人侵占我国华北时修建的长度仅有一千米的小机场,只能提供小速度运输机的使用。1959年,我国引进苏制伊尔—18后才将机场延长到两千米。由于西郊机场位置离市区较近,使用方便,所以大量接送国家与军队领导人及部分外宾的专机都从这里起降,机场的小候机室已经容纳不了首长及迎送人员暂时休息。尤其是寒风凛冽的冬天,迎送的人们仍然不得不站在停机坪上。我将此情况向总理汇报之后,总理同意修建一个大一些的候机室,但总理反复交代:“要注意节约,房子大一些,多坐一些人就可以了,一定不要铺张。”当我们按照审批程序通过空军司令员将报告送到总理那里的时候,总理不但在报告上再次嘱咐“注意节约”,还具体写明批准金额四十万元。国家总理处处想的是国家整体的情况,想的是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困难。当时我们一个专机师的账上也只有几万元的资金。总理当着国家的家实在不容易!

执行总理专机任务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总理时刻没有忘记对机组人员的关心与教育。有时,总理还请机组人员吃便饭。总理总是告诉秘书,让机组人员随便一点,不要过于拘谨。临别时,秘书总是亲自送我们上车,等我们离开后才回去。总理到沈阳为辽宁省厅处级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时,也让机组人员参加。就是在国外给大使馆人员讲话时,他也同样没有忘记让秘书叫上机组人员一块儿听。

杨尚昆和李克农都感觉到,清理出一个局部比较安全的环境,是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因此两人很快达成共识,中央机关到北平后,起码在一段时间里不宜驻扎在城里。

晚间,杨尚昆和李克农一起到周恩来的办公处,将他们的共识做了汇报。周恩来对中央机关进北平后驻地暂放在城郊为好的设想表示同意。随后,周恩来确定李克农于2月3日动身去北平,以加强北平清理敌特和迎接中央机关的准备工作。

为了协助李克农在北平的工作,杨尚昆决定让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中直供给部副部长范离,随李克农一同前往北平。

这一天,周恩来介绍了两个人给杨尚昆,他随即安排他俩到李克农那里报到。这两人一个是专门从事扫雷工作的,一个是搞无线电专业的。杨尚昆要他们随李克农到北平,参与机关驻地的安全检查工作。为了驻扎地的安全,要对驻扎地可能隐藏的爆炸物及窃听装置进行仔细全面的探查和清除。

在随后的几天里,杨尚昆与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的方志纯,谈了转移中应准备的事项。还约邓典桃就转移的计划、运输力组织、物资处理及人员处理等,做出一系列决定。

在李克农离开西柏坡后,杨尚昆陆续收到了他从北平发来的电报。李克农在北平,同叶剑英、彭真就中央机关进北平后的驻地问题作了几次商讨,建议先以离北平城区二十公里外的香山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

在有了这一设想后,李克农和时为北平警备司令员的程子华一起到香山进行了勘察,他传过来的消息称,香山一带林木葱郁,环境幽静,利于防空隐蔽。香山有座慈幼院,有几处现成的院落,中直机关五千多工作人员大体可以在那里安置。另外,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香山有个别墅,可用作毛主席的临时住所。

2月9日,李克农又发往西柏坡一封电报,对中央机关进北平驻香山,有了一个更具体的安排。为了保密,此时已确定下中央机关进北平后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以“大学”代称中共中央,是早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就发明的创意,中共中央到西柏坡后,还曾以“农业大学”代称。“农大”叫开后,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还跑到那里要求报考。

中央机关驻地的中心就设在香山,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等机关,都将驻扎在那里。中央军委机

杨尚昆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一再提醒身边的人，提醒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干部：“要有所警惕，不要对进大城市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不要有过高的要求，要保持我们党一贯的艰苦朴素作风。”

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之际，大搬家、进北平的事情已经酝酿了两个月，许多人都在议论，大多数人都感觉准备得差不多了，急于动身渐渐上升为主流情绪。周恩来在与杨尚昆研究有关工作时，也透露出全会一结束就动身的意向。

但在全会结束前一天，李克农从北平发来《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的电报，电报说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北平的秩序还比较乱，希望再给一点准备时间，请中央的搬迁稍缓一缓。

鉴于任弼时的身体情况、周恩来将在一段时间里要集中精力同南京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中央机关大搬迁及进北平后安置工作的繁复及中央办公厅在此项工作中担负的重要角色，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朱德来分管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朱德对杨尚昆说：“你们放手工作，我愿意为你们撑腰。”

3月16日入夜后，到北平协助李克农做搬迁准备的赖祖烈回到了西柏坡，是周恩来专门让杨尚昆把他招来的。听他讲述了北平方面的情况后，杨尚昆拉着他立即去向朱德和周恩来作汇报，随后他们一起讨论了搬迁之事。

朱老总告诉杨尚昆：“毛主席的意思是还想再留住两个月，南京派人来进行的和平谈判，就在西柏坡进行。”但周恩来和任弼时都主张快些进北平，既然进城的决心已经下了，而且北平的政治活动日趋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已很难适应形势的变化。

周恩来、任弼时的观点，后来被毛泽东接受了。3月17日那天晚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已经拟好还没来得及发表，杨尚昆就得知中央书记处已经做出决定：中共领袖和中央机关将于23日起程，向北平进发。

19日，周恩来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布置大搬家事宜。从北平刚回来的赖祖烈在会上介绍了香山中央驻地的情况。接着，杨尚昆根据中央机关的组织系统、工作性质，就哪些部门应该先随书记处一起走，征求了与会者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讲了话。他首先告诉大家，中央已经确定了到北平的时间，中央书记处将于25日抵达北平。在随后的讲话中他强调：中央迁入北平，是去工作的，是去克服困难的，而不是去享受、去安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他

立即找三个铺保,房东太太这才答应他住下。事后父亲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并下发通知,今后住机关购买家具、用品必须注意避免千篇一律买便宜货,防止暴露身份……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历任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兼第一书记等职。1961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前就首批和一些中央各部老部长一起靠边站,同时被揪出来批斗。贴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拒不执行少奇同志指示就是反党、反中央”。不久他又变成了“刘少奇的黑干将”、“黑帮分子”、“走资派”。记得第一天他被揪斗后下班回家,他仍像往常一样左臂挟着一个装满文件的黑色大皮包,但皮包中间多夹了一个写他名字打红叉的木牌子,右手还托着一个写满“三反分子”的高帽子。那天晚饭后他仍如常态工作到深夜。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欺上瞒下,以莫须有的罪名蒙骗群众,妄图再次把父亲置于死地。父亲这时已七十岁高龄,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气管炎、眼睛黄斑出血等疾病,但他从不气馁,意志信念仍是坚定不移,坚信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拿出过去对付敌人的手段去对付整他的人,他说:整我的人不都是敌人,对敌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同志怎能采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呢?

别有用心的人经常强迫父亲交代他过去经手和记忆中的机密,要他提供攻击某些中央领导人的炮弹等,他始终缄口不语,什么都不讲,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父亲那时年事高又多病,身体状况非常差,我们做儿女的真担心他熬不过去,但他坚持挺过来了。他总告诉我们要放心,他不会死的。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去,别人说是自杀,你们坚决不能相信,一定要搞清楚。

后来对他揪斗越来越频繁、升级,推搡拖打、弯腰“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每天回来他满身都是泥,鞋子被拖破,中山装衣扣被拽掉,领子袖肩被扯坏,裤襻被拉

也就是说,拘捕胡风根本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序,而是根据有关命令进行的秘密逮捕。在逮捕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做出拘捕决定。这个迟到的决定,只不过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形式。

拘捕胡风的行动由公安部执行。

公安部事先将此秘密通知了全国作家协会有关领导,并由作家协会派一名熟悉的领导随行。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公安部的人穿着便衣,将汽车停在门外,装着找胡风有事的樣子,趁吃晚饭的时候,来到了胡风家里。

胡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几个人会将他的生命之舟,带向另一个完全陌生又充满危险的海洋。

几个人在屋子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胡风的夫人梅志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感到这间小小的屋子,有一种山雨欲来之势。

自从胡风的“自我批判”材料和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给舒芜的信公布后,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就被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了。胡风夫妇为之吃惊,为之苦恼。说他有点个人主义,有些小团体主义,有些宗派主义……他都会承认,可说他反党,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可是后来冷静下来想一想,也就没有完全放在心上,总认为迟早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顶多在文艺界或报刊上开展一些批判,只要思想转过“弯”来,认真地进行自我批判,是会得到组织的谅解和信任的。

胡风对自己的被捕感到很突然。

从13日到被拘捕的16日,这几天里全国上下都在“学习”那些报上的“材料”,而胡风本人则同过去一样地开会、会见朋友和练拳,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与文艺界领导的这种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认识,以及那些与友人交往的信件,会发展成为一件共和国历史上的惊天大案,一个全国上下数亿人都投入的运动,各行各业都会对他进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判,除了自己之外,还会牵连到两千多名无辜的人。

公安部的人向梅志出示了搜查证,对胡风家里进行了搜查。

屋子里的书很多,搜查人员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根据要求,对屋子里的信件搜查得特别仔细,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一个地方,便于最后带走。

一直搜查到半夜,才算结束。

出一本《词品甲》，是欧阳竟无大师选的一本词，里面夹着亲笔题签，像是多年前送给父亲的。当时大师已辞世。

他拿过那本词选，先试了试我的阅读和理解力怎样，之后问：桂槐、飞镜、玉兔何所指？待我回答无误，又问《词品甲》，“品”字在这里作何解？我答作品味、品评解。之后他让我看欧阳大师所作序言。大师选这本词的主旨，正是想让人注意，自古词人多柔纤之作，但词非止长于此，词也可作“狮子吼”。我领会了这层意思，此后对诗词的爱好，趋向豪放一路。

1944年秋，日本人作困兽斗，攻陷桂林。父亲为避免去重庆，坐木船沿漓江南下，再转桂东八步。在船上住了将近十天，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闲聊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但他仍不做纯粹的闲聊，而是讲民国初年的政治掌故给我听，既有趣又增加了我对中国政治的了解。

可是有一次，他讲起了《论语》。一般中学生没有听过《论语》，我则不然，来桂林前我就读的勉仁中学正是父亲的“朋友聚会处”，有门课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即每周两堂课选讲《论语》。两年多的时间，我已经记熟了数十条孔子的话，也就受了一点儒家思想的熏陶。如“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我的印象是孔子脾气非常好，但孔子主张一种怎样的人生，则完全没有想过。

现在我已记不起谈话是怎么转到了孔子的。父亲深情、缓慢地背诵了两段论语，一是子贡请示孔子可不可以在行告朔仪式时，省去杀一只羊。孔子答复：“赐也，汝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承认子贡节省一只羊的考虑有道理，可是就孔子而言，他认为应该郑重其事地完成仪式（礼）。即告朔仪式本有定规（常规），但孔子不因有定规在先而坚持一成不变，这件事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不因先有定规便认定另一种意见即是谬误。

然后父亲又背诵宰我问孔子那段。宰我问，父母死了守丧三年是否太长？孔子不以“可否”作答，只问宰我父母死了不到三年就穿好的、吃好的，“于汝安乎”？宰我回答他心里没有不安。于是孔子说“汝安则为之”。孔子的意思还是可按自己的心意做，全看自觉，不搞硬性规定。

我知道早先有“打倒孔家店”运动，读过《狂人日记》，鲁迅刻画了一个阴森森的社会以证明礼教吃人。当时我上小学五年级，确觉可怕。但因此，我心里就有了两个孔子。

十余年,曾经因为政见的分歧,两人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各自站到了不同的政治阵营;在学术上他们既互相关注、互相切磋、互相欣赏,又有争执。正如陈垣的孙子陈智超后来总结的那样:祖父陈垣和胡适在许多方面有很大差异,最易为人感觉的,一位是“土学者”,一位是“洋博士”。两人在长时间内是学术上的诤友。

以文交友

陈垣六岁来到广州读书。少年时,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1905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为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1913年陈垣在北京定居。在北京的头十年,他一面从事政治活动,一面从事学术活动。他曾在一个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基督教史。陈垣在学术上的成名缘于对宗教史的开拓性研究。1922年他担任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此期间,陈垣形成一个重要观点,即“应该把国际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国际汉学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包括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内容。它与中国人自己所称的国学是相通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可以说是国际汉学的先驱者之一。由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开始认真地对待与探究中国文化,从而形成了西方人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文化的开端。这样,以外国教会一部分神职人员专注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19世纪初,国际汉学研究在欧洲进入大学的殿堂。20世纪初,随着法国巴黎“汉学讲座”的设立,西方汉学的成果不断涌现,这种情况给了中国学者很大的刺激。陈垣感受尤其深,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现代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国际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垣这段话的意思,并非排斥国际汉学,而是激励国学研究。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这种“夺回国际汉学中心”想法的不止陈垣一个,还包括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

胡适于1917年自美返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3月,北大《国学季刊》编辑部成立,胡适任编辑部主任。同年4月,被举为北大教务长。当时北大还有一位教授沈兼士先生,他既是《国学季刊》的编辑委员,又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由

中国另一位历史学家、陈垣和胡适的老友傅斯年,在看过陈垣的公开信和胡适的跋文后,于1950年9月28日在台湾的报纸上撰文指出:“适之先生作了一篇考据文,证明陈垣先生的‘公开信’是别人作的。”

胡适于1962年2月去世。尽管他作了翔实的考据,但实际上对陈垣写《公开信》的疑虑一直没有打消,为此他曾托人打听陈垣在大陆的真实情况。他至死也不知道,与他相知相交几十年的老友陈垣的这封《公开信》,确实是其心血之作。当陈垣看到胡适在旧金山的谈话后,立即和他的学生刘乃和、柴德赓以及刘乃和的胞弟刘乃崇商讨,决定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告知胡适等海外知识界人士。此信由刘乃和执笔写出,再经陈垣亲笔改定。后陈与刘同去历史学家范文澜住处,请他修改。范的修改只是将原标题《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中的“先生”两字删掉了。陈垣的孙子陈智超手头至今还保留着这封《公开信》的底稿。

陈垣与胡适的分道扬镳,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对不同的人生态度抉择时的心路历程。

回归学术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除了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还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并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胡适则游走于美国和台湾,一面讲学,一面从事一些台湾当局的政务活动,1957年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尽管当时两岸同胞互相隔绝、音信全无,但这两位杰出的学人仍然互相牵挂。政治色彩在他们面前逐渐褪去,两人又都回归到过去,回归到学术上。

1959年1月3日,胡适以院长的身份,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团拜会上讲到关于汉学中心的问题。他说20年代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过将来国际汉学中心的位置,究竟是在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东京,还是在法国的巴黎?他还回忆起当年谈论国际汉学中心的一些话题,感慨良多。

1959年5月13日,有一学界同仁拜访胡适,要借“中央研究院”的《道藏》翻印,胡适当即表示不赞成翻印。胡适对那人说,陈垣著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本书是值得印的,这本书里面说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的源流很详细,收了很多碑

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

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了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我的老伴在成都教书时,那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儿子的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也算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送我儿子到空军医院去抢救,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总算捡了一条命。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了一餐饭。

打仗很残酷,我们像所有老百姓一样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去了美国。

在美国,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我内心很矛盾,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当时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张允和在 Illinois 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我们的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了。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

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也很紧张,特别是星期天,常常自己买了菜,做中国菜。中国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来吃饭,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每个星期天都在我们家吃中国菜,开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书由一个美国人翻成英文,销路挺好的,赚了钱给了老舍一万块,老舍就用这一万块钱到美国玩。罗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学里教书,教语言学方面。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

我不敢让张允和去工作

1949年6月,我们从美国回到上海,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生活很好,当时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兼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

之这样年轻,像个猫脸小男孩。”也可以这样说,打小开始,胡适就在张爱玲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久,收到《秧歌》的胡适给张爱玲回了一封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 10 月 25 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

胡适的信很长。看到寄回来的书上圈圈点点,张爱玲又吃惊又兴奋,很快给胡适回了一封信。因为对胡适太过尊重,她的朋友竟然帮她保存了这封信的底稿。几番书信来往,张爱玲与胡适之间又多了一份亲近。

表面上看,张爱玲出书后给师长胡适寄一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一向孤芳自赏、不屑见人的张爱玲来说,此事并非如此简单。她一反常态,在与胡适从未谋面,也没有任何书信往来的情况下主动寄书寄信,其实是有着她的用意——一来,想借此试探胡适文学上的眼光;二来,想试试胡适是不是世故之人。因为接下来她要有一个重大行动:前往美国。

其时张爱玲在香港已经待了三年,三年里她始终心不在焉,一直把香港当成一块跳板。她的目标是美国,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1953 年,美国颁布了难民法令,这让张爱玲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当时的难民法令规定:允许学有所长的外国人迁居美国,并可以逐步过渡为美国公民,其中远东地区指标为两千人,主要给居住在香港地区的大陆人。张爱玲符合这两种最主要的条件,她马上向美国方面提出了入境申请,并且由“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负责人麦卡锡做入境担保人。张爱玲就在这段时间与胡适频频通信,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不久以后在美国的发展铺平道路。

胡适在中国作家眼里是一个标高,张爱玲自然是仰望的。但是在她最当红的